

印迹

TRACES

トレイシーズ

흔적

A MULTILINGUAL JOURNAL OF CULTURAL THEORY AND TRANSLATION

本辑主编 墨美姬 布雷特·巴里

“种族”的恐慌与移民的记忆

"RACE" PANIC AND THE MEMORY OF MIGRATION



江苏教育出版社



2

印迹 TRACES 트레이シーズ 흔적

A MULTILINGUAL JOURNAL OF CULTURAL THEORY AND TRANSLATION

本辑主编 墨美姬 布雷特·巴里

“种族”的恐慌与移民的记忆

"RACE" PANIC AND THE MEMORY OF MIGRATION

◎ 江苏教育出版社

书 名 “种族”的恐慌与移民的记忆
——“印迹”(2)
本辑主编 墨美姬 布雷特·巴里
责任编辑 吴葆勤 任 晖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邮编 224001)
电 话 0515 - 8322277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28000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43 - 5694 - 6/G·5389
定 价 29.80 元
邮购电话 025 - 85400774, 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 - 83249327, 83249091
盗版举报 025 - 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宗 旨

《印迹》是一份多语种国际性学术论集,旨在关注在各特定地方所产生的理论知识的全球印迹,探讨理论自身是怎样由不同地点的实际社会关系所构成和改变的。我们渴望找到产生于完全不同地区的理论,包括那些过去几个世纪中常常由于殖民与半殖民而形成的在北美和西欧“理论”混杂关系中所产生的批判理论著作。我们所发表的研究论文、观点交流和评论,将面向多语种的读者,除了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以及批判种族研究,或后殖民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外,也包括各传统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同时,《印迹》也意在创造一种不同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与经验材料,不同理论思想本身的对话与争论的方式。

《印迹》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在这本论集的所有语言版本中出现。每一位撰稿人都将完全理解,她或他是为完全不同的、多种语言的读者写作:就像一位殖民统治下的当地知识分子一样,每一位撰稿人都需注意这种多向性。《印迹》形成和支撑着一个国际性空间,然而它又根本不同于所谓国际主义的刊物。国际主义刊物是建立在某一主导语言对其他弱势语言的主宰性基础上的。我们真诚希望,这一我们在其中争论和交流的社会空间将挑战民族和民族语言所构成的空间。我们的这个空间由翻译过程构成,有多种语言和人员参与,通过我们之间的争论,通过作者、评论者、翻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而得以维持和扩展。

执行委员会

汪晖(北京), 高建平(北京), 王晓明(上海), Eun-shil Kim(汉城), Meaghan Morris(香港), 鹤饲哲(东京), Yann Moulier Boutang(巴黎), 小林敏明(莱比锡), 丁乃非(台中), 酒井直树(伊萨卡), Thomas LaMarre(蒙特利尔), 姜来熙(汉城), 小岛洁(东京), Brett de Bary(伊萨卡), 花轮由纪子(伊萨卡), J. Victor Koschmann(伊萨卡), Brian Massumi(蒙特利尔)

编辑

酒井直树(伊萨卡)

副编辑

高建平(北京), Thomas LaMarre(蒙特利尔), 姜来熙(汉城), 小岛洁(东京), Brett de Bary(伊萨卡), 花轮由纪子(伊萨卡), J. Victor Koschmann(伊萨卡)

编辑委员会

酒井直树, Thomas LaMarre, Meaghan Morris, Brian Massumi, 崔成模, Dipesh Chakrabarty, 汪晖, Eric Alliez, Christopher Fynsk, 花轮由纪子, Brett de Bary, 平谢, 赵刚, Ulrich Schneider, Anne Berger, 崎山政毅, Jon Solomon, Leo Ching, 丁乃非, Antonio Negri, James Siegel, Kwang-hyun Shim, J. Victor Koschmann, Peter Osborne, 于治中, Sechin Y. S. Chien, Elizabeth Grosz, Timothy Murray, 鹤饲哲, 黄平, Eun-shil Kim, 富山一郎, Ien Ang, 岡真理, Oliver Marchart, 高建平, Sue Golding, Yann Moulier Boutang, John Kim, Kenneth Dean, 小林敏明, 姜来熙, Jungwoon Choi, Wing-sang Law, John Kraniauskas, 王晓明, Alberto Moreias, Gabriele Schwab

顾问委员会

Tessa Morris-Suzuki, Ben Anderson, Harry Harootunian, 瞿宛文, Stuart Hall, 陈光兴, 伊豫谷登士翁, Jacques Derrida, 成田龙一, Soyoung Kim, Anne Berger, Beng-Huat Chua, Haejoang Cho, Benjamin Lee, Catherine Hall, 廖炳惠, Nora Bierich, Sandra Buckley, Tani Barlow, 柄谷行人, Gayatri C. Spivak

导 言

墨美姬 (Meaghan Morris)

这是《印迹》这一全球性文化理论和翻译的辑刊的第二辑。《印迹》的创刊是为了挑战在旧殖民和冷战格局统治所形成的长期影响下“理论”与“文化”的传播方式和“翻译”被设想和建构的方式。这本杂志在发出这种挑战时并不是孤立的。今天的许多学者都对这样一种设想仍在持续感到悲哀：一个普世化的“西方”生产并向“其余”输出理论，这些“其余”地区充满了文化资源，却失去了估价其丰富的个性并使之变得为“西方的读者”所理解的智能。关于在人文学科（被定义为普世的）和“区域研究”（重新确认个性）之间划分的传统，在理论的与实用或日常的知识之间进行的充满着价值含义的区分，以及在一种所谓知识的“新全球经济”中其他划分（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前殖民地的边缘地区与大都市）所扮演的角色的争论到处都在升级。但是同时，广泛传播这种争论的力量正日益集中在少数北大西洋沿岸的跨国英语出版者手中。“旧殖民”劳动分工支撑着新的语言等级制度，这甚至比帝国的地图还要狭隘。在这些地图上，西班牙、法国和德国拥有特权，还有日本和中国。我们对此可能会感到痛惜，并用许多种语言进行地区性的争论，今天如果要生产“国际性”的理论，我们就必须用英语来写或被读。

作为多学科的翻译辑刊，《印迹》寻求学术对话和论争的一种独特的传播方式。这本杂志以多种语言出版。原则上，每一篇文章都同时有中、日、韩、英四种语言版本（如果资源和劳力允许的话，还会增加其他的语言），每一位为《印迹》撰稿的作者都使用一种语言和一种他/她所选择的学术参照框架，但他们必须了解为印迹写稿会面向杂语的接受者^①：

① 关于“Writing for Multiple Audiences and the Heterolingual Address”，请参见 Nao-ki Sakai,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and Londo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7.

每一篇文章都不仅是为了用多种语言来阅读而写的,而且其读者会很混杂,既非限于一共同的文化之内,也非整齐地划分成独立的“社群”。这里的翻译不能被理解为在敌对的民族—语言国家之间的外交形式,而是作为构成新的理论交流的国际空间的一种手段。在这个空间中,对于“同一”问题——以及“同一”文本——质疑和反质疑可能会出现在那些如果没有这份杂志,也许就不可能交流的人之间。在建构这个多语空间的实践中,《印迹》寻求一种新的文化理论观。^①

辑刊的创刊号《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简述了辑刊构建真正具有比较性的文化理论的计划,它不会(正如引言所说)“忽视由于差异而导致通约的行动形式,并因此也就将异质性的事物置于比较研究的平面”^②。这个计划的艰巨性和迫切性都在这第二辑中居于显著地位,本辑主要讨论由于近几十年来遍及世界的高涨的移民潮、严重的经济混乱以及地缘政治动荡而激发的恶性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

对这样一个全球性问题作出多语反应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在《印迹》采用的所有语言中,都有对此讨论的令人吃惊的发展,并提供了从中引出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分析。这份刊物的一个直接目标,是将这些讨论和分析的一部分带入一个共享的知识空间。翻译起着一种将否则就不会相互交流的不同的读者群和作者都连接到一起的作用;在遇到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之外的批判性的回应时,在常常针对与我们以为知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的情况发言时,我们就获得了对与我们直接有关的语境的新的理解方式。

这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传统优点,对跨国资本政治合法性的关键词——“新经济”、“全球重构”、“信息革命”、“公平(经济)活动平台(level playing field)”等等——在全球通用,以创造一种政策的连续体,从而不仅产生真正的社会冲突和经济贫困,而且提供乌托邦式解决的许诺是至关重要的:种族主义暴发(事件发展的一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向新经济过渡时期全球化的“失败者”之中,但是这些仅仅是“他者”(the Other)的一种原始的恐惧的“非理性”泛滥或隔代“回归”。这种恐惧可以由技术进步和更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消除。近几年,波

① 这一说明是以酒井直树、Thomas Lamarre 与平谢共同为《印迹》所写的计划书为基础的。

② 见《印迹》第1辑《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酒井直树所写的“引言”。

斯尼亚的“种族清洗”，横跨从法国到俄罗斯整个欧洲无耻的排犹倾向的再度复活，对印度尼西亚华裔的攻击，法国、德国和瑞典对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打工者的攻击，澳大利亚波林·汉森(Pauline Hanson)的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的“白色恐慌”(这里只列举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都可以从上述一厢情愿的简约的术语中看出。这一期的《印迹》通过将在全球化政策连续体的不同地区工作的学者们放到一起(在这里，卢克·吉本斯(Luke Gibbons)讨论它对爱尔兰的影响，黄平谈中国的情况，郑暎惠更侧重于日本，田佐·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则谈到日本和澳大利亚)，而建立了一个“比较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市场乌托邦主义的允诺可以受到质疑，就像对它的实际效果的种族主义反应也同时受到辩驳一样。

在这两种广泛的活动之间，本辑刊物的更为具体的目标是考察特定的移民和种族化运动的历史的和情感的复杂性。殖民主义与宗法式民族主义残存的负担是这里的主要焦点，同时还有移出与移入的经历。在近几年的许多种族暴力冲突中，新的经济与社会配置的力量都正在冲击着依然与早年遗留问题或其他帝国主义和民族建设运动作斗争的人们。这里所收集的论文在对冲突与更替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作出回应并参与进去之时，对文化记忆的成果进行了探索；它们提出这样的疑问：过去的冲突的记忆和叙述如何对现在的紧张形成暗示？同时也分析了更替的记忆被激活的当代语境。

在此过程中，一种不同的对全球性的追踪被写进仍在很大程度上由用英语传播的“理论”悄悄地决定的世界历史地图。这是一张过去几个世纪欧洲中心主义、欧洲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分布图。它强调它们的影响对全球的覆盖，然而其强调方式是戏剧性地突出西欧和美国这些重要地区；视域不断地收回到这个理论世界的高度放大的“中心”，而其余的地方依然是模糊不清：它们只是为了建构批评所需用的一个粗略的背景，而不是建构批评所关注的焦点。对于由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所形成的思想的反映，以及其他那里也将自己当做中心的地区的政治学，这幅地图告诉我们的就很少，而关于这

* 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1997年成立的一个极端右翼的政党，主要政治观点是限制亚裔移民和土著民族，减少对外援助，为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该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波林·汉森(Pauline Hanson)，1954年生。——译者注

些思想和政治的运动反过来对“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它告诉我们的就更少;它并不将事件描绘成“白色”和“欧洲”在其中扮演次要角色,作为第三方或居于不重要的地位。

这幅地图今天并不能帮助我们用全球化的观点思考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它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或它省略了什么叙述,而在于一种理论地理学的形式所设置的思想障碍。这种理论地理学一次次地将批评的欲望引向我们所熟悉的那部分“西方”,以至于限制了我们透过那些我们(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所继承并当做自身的历史以外的诸历史进行思考的能力。^①随之而来的是实际而世俗的困难:许多新的学术作品为地图的模糊部分增加了细节,但是极少有作品在指定的专业或领域之外,由于其理论意义和方法上的革新而为人们广泛阅读(在英语语境中,通常是“区域”或“后殖民”研究)。^②那么,该做什么呢?生命短暂,时间有限;即使这样一个事物——一幅理论上的世界历史性的全景地图——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也不可能在今天的学术工作条件下使用。

在这辑刊物中出现的对全球性的多语种探索既非没有遗漏,也非反映今天的种族主义和移民的世界分布情况等内容的“更具代表性”的图画。我们并不希望撰稿者把“狭隘”的兴趣放置一旁,也不希望他们放弃与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有关的研究,他们也不是以达到国家、种族或学科拥有物的适当传播而聚在一起的,《印迹》不是理论的联合国。世界的广大地区、许多种族主义和大量被迫和自愿的移民方式在这里都没有考察;这一辑没有涉及奴隶制,也没有直接探讨难民问题。

① 这个思路受到了阿伦·普雷德在另一个语境中所说的关于拒绝机制的话的影响。普雷德是在谈到“某种流行的地理学想像”的话题时说起种族主义的。他将种族主义说成是“与有限数量的骇人听闻的事件相联系的地区的典型”,从而将之看成是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事件。Alan Pred, “Memory and the cultural reworking of crisis: racisms and the current moment of danger in Sweden, or wanting it like befo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6 (6, 1998), 635.

② 我心里想到的是像 Heather Goodall 的 *Invasion to Embassy: Land in Aboriginal Politics in New South Wales, 1770—1972* (St. Leonards, NSW, 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6); Gail Hershatler 的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Anne McClintock 的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 等一些著作。

但是,它作为一个具有紧迫感却又宽泛定义的问题的国际讨论,以“翻译”的形式成为一个整体。我们只要求撰稿人同时考虑与他们直接相关的危机(或“恐慌”)的语境及其活着的历史层面——即对驹込武所说的“暴力的层层累积”进行彻底考察。

因此,全球性是在文章的非预期的联系线索的出现、令人惊异的会合点、出乎意料的研究和思考的重合之间寻找到的。例如,驹込武对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宗教的种族化作用的研究需要一种英国、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综合的历史”,它直接与卢克·吉本斯对苏格兰启蒙时期的殖民力量的描述,以及对这种力量在理查·罗蒂著作中的魔力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吉本斯对爱尔兰日益增长的针对移民的种族主义的思考一方面为亚·穆利耶·布唐对在移民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模式或“合理协议”的批判所启示的思路提供了资料,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表现了反移民行动的传统和国际劳工运动的情绪。沿着这辑刊物的另一条“对角线”,吉本斯的文章也涉及(以另外一种情调)某些“少数民族地位低下的秘密”:这个问题同样也引起了周蕾的一篇讨论在北美充满着“无法解决的紧张状态”的种族主义和阶级差别的多元文化主义“狂热病”语境中关于种族区分的写作政治学文章的注意。

周蕾在关于文化混杂的理论写作与虚构或自传写作之间“情感不协调”的语境中进行的探索与伊恩·昂和格桑·海琪寻找可以清晰描述的话语方式相呼应。这些话语方式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华人所体验的“受迫害”感,种族、国家与经济财产之间的历史记载剧烈变换所产生的矛盾心理,以及(对于海琪来说)在一个不是简单地被“黑人”与“白人”,而是被“原住民”与“移入者”之间的冲突所分裂的澳大利亚中非不列颠/爱尔兰移民的责任和参与的两难抉择。——冲突产生于一种殖民主义,在其中,因为这些移民自身也是种族主义的牺牲品,所以不是由于祖先,而由于他们或多或少天生就是如此。这三篇文章在关注自传性时,都使用了金成礼在《四月三日大屠杀》中所定义的“责任感”。这场屠杀于1948年发生于韩国半岛的济州岛,文章是以“仔细地倾听每一位受害者个人的故事”的行动开始的。

金成礼这句话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但是她在韩国所看到的将以倾听为前提的了解和支持当做一种“任务”和“对痛苦中身体的责任”,在其他一些人的研究中得到了实现。杰奎琳·阿米霍-侯赛因研究了

纪念性的叙述是如何在 1873 年遭到中国西南地方政府支持的对穆斯林大屠杀的人的后代们中间“制造”幸存者的；知足院美加子通过制作雕刻以回应北海道阿伊努人过去的家园被二风谷大坝淹没所作的思考；同样，毛利嘉孝对知足院的作品的评论都与此类似。听的政治与艺术对黄平的对农民大规模外迁至当代中国的广大地区时表现出的“生存理性”，对这种迁移的积极意义以及非意志所控制的后果可能与一种“经济理性”的逻辑相冲突所作出的带有社会学色彩的研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倾听当然也是在写作时对其他入，如维克托·科施曼、田佐·莫里斯-铃木、崎山政毅、岡真理以及我的编辑合作伙伴布雷特·德·巴里所写的文章作出紧密呼应的基本而必要的条件。

还有许多其他探索这一辑的文章之间联系的途径。我的观点是，对于全球问题作多语的反应，既有方法论的“价值”，也有提供知识的“价值”；当我们遇到处理看上去熟悉的问题的新方法时，它们的“熟悉性”就发生了变化，我们讲述它们的整体框架也得到了开启和增加。反复阅读这一辑的文章时，布雷特和我都学到了与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有很大不同的情况；或许我们各自也获得了更多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反思这个过程及其所需要的日常劳动，布雷特刊登在本卷卷末的“编辑日志”是（在我看来）对过去几年中《印迹》这个为形成一个多语的文化交流空间所做的翻译和比较工作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观念的发展过程最清晰、最敏锐、最能引起联想的叙述。

然而，让我把注意力收回到一个难题上来，不忽略“活动的形式”（包括编辑、翻译和为翻译而写作），这些工作使我有可能会通过前面所作的相应的总结而将汇集在这里的文章构成一个整体。这些是第一次用五种语言（英、法、中、日、韩）写作的文章，这些文章来自澳大利亚、美国、爱尔兰、法国、中国大陆、日本和南韩的学术圈，文章所涉及的冲突和历史重负的范围不仅包括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日据时的台湾，而且也涉及到在由形形色色的国家或帝国的规范进行限定的过程之中其差别已（有时通过强大的暴力）得到认可的地区和人群：印尼的土生华人与境外生华人、亚裔美国人、韩国济州岛人、中国云南的回族人、阿伊努人、山伏人^①、澳大利亚土著人、阿拉伯-澳大利亚青年、九州人。我所列的这个目录有些粗略，只是强调它们作为一组

① 山伏人，日本修验道的修持者，强朝山和隐居山中修行。——译者注

“异质的东西”所具有的几乎是随机的性质。这些名称中有一些是我所熟悉的,但是某些在1999年我开始为《印迹》工作之前从未听说过。然而,这里我正在冒昧地介绍由这些名称所组成的研究和有时是由其学术生活和语言对于我来说是大部分或完全不知道的学者所写的文章。

我用英文写作,在香港一所学术机构工作,但是我的脑中却有一种“程序”感和一套规则,这既是由我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白人所深深卷入的那个国家充满着,并为之而困扰的“种族”及移民政治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我很偶然地参加了一个其影响横跨太平洋的英美学术机构。在我开始写作时,“习惯性”的问题从我的学术机构的这些资源(它们各不相同)中涌现了出来。例如:我在使用“异质的东西”这个短语时足够细心吗?将它从《印迹》第一辑的语境(对翻译活动的技术性讨论)中抽取出来,在这个关于种族主义和移民的新的讨论语境中,创造动物学意义上的“民族集合”的印象是可能的吗?^① 在我们可以对可以在两个封盖之间塞满多少种差异性感到惊讶时,它将使《印迹》看上去像一个自由的多元的练习吗?并且,如果它对于某些人来说有这样的印象的话,那么不管我说什么——在这个语境中,我介意吗?另一方面,我应该证明这些构成这个目录的限制或者遗漏之处(当一个今天有影响力的用语用来表示任何选择的或偶然性的产物时)还是应该对它们感到遗憾呢?对于这些问题我可以尽全力去解答,然而更为困难的是,对于一个问题我甚至无法开始去想像对它的回答:当这个文本在韩文、日文或中文中被当作对一期杂志的文章的介绍来读时,同样的问题,以及我将它们作为“习惯的”来提出,应具有什么意义?确实,我对于这一期议题的简述是哪一种意义?当这个简述和这些声明在不同于我写作时所使用的各种语言和学术文化中被阅读时,我所宣化的全球性又有哪种意义?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的确知道“异质性”并不一定使《印迹》的所有语言都有它在今天的学术英语中所具有的同样具体的、具有魔力的力量。我知道,不是世界的每一种学术文化(包括“西方”)都从开始就确信“多样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好东西,确信“差异”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至少,它们不同于建立在移居者殖民主义(正如我自己的

^① Ghassan Hage, *White Nation: Fantasies of White Supremac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Sydney: Pluto, 1999).

社会那样)和政府发起的大规模移民基础上的社会中具有突出地位的那些价值方式。我知道,当对移民的讨论同时既涉及临时居住的“客居工人”模式被当成一种常规而固守(如在香港),也涉及实际的或潜在的公民权使移民问题长期受到争论(如在澳大利亚),当近期的经济变化使移民问题成为一个敏感的、某种意义上成为新的讨论话题(例如,在爱尔兰和日本)的情况下,深刻的误解很容易产生。如果我熟悉的不是今天发生在“韩国”、“中国”和“日本”,而是以韩文、中文和日文进行的理论争论的话,我只能在这些零碎的知识之上补充我对于那些或许形成这篇序言的可能的程序和规则的某种无知。

这是《印迹》计划的核心问题。你并不知道你的语词和预设₁在译成不熟悉的语言和处于未知的阅读语境时将具有怎样的意义。无疑所有远离作者传播的作品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数作品是依赖于忽视翻译活动的形式以及由这个活动所增加的接受者的不确定性(因而也使所指对象的不确定性),并使之变得无意义。当然,必须按照常规改变语言,以保证“国际”接听的学者们熟悉这些不确定性和它们对思想的不稳定影响。然而在标准的“学术英语”中,翻译是次要的事,我们为想像中的读者而写作,我们不仅与他们共同使用同一种语言,而且还共有同一套理性优先原则,同一种规范、同一种政治和职业的参考框架。在这个翻译体制中,一个文本的更为广泛的传播都被认为是随后发生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这是一种令人愉悦、却无法预料的成功标志。在为《印迹》写作之时,那个熟悉的对观众的想像失去了其确定性;对于每个人来说,“其他读者”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并积极地参与文章的构成。把翻译放在第一位意味着控制的丧失,即使当它削弱了在常规的批评工作中能够消耗如此多的时间和空间的保护策略的力量时也是如此。在这个计划中误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彼此交流的努力的本质因素来接受。因此,工作的重点从预先避免向表述的努力本身转移。用多种语言写作并进行理论化不是要宣扬语言上的排他主义。相反,它有时甚至要冒着造成既跨越语言又跨越国家和文化的疆界的普遍化的危险。我在此强调“造成”;这是一个实践性的和集体性的过程。它并不稳定,可能会失败。

在生物学上和文化上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目前在₂全世界盛行的经济剥削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条件下,进行这样的努力的利害关系是很清楚的。一些从事这些议题研究的学者受到有关

民族—国家的衰亡,以及/或者我前面提到的精英的一致意见,即任何种类的种族主义都是一种不道德但在历史上是过时的现象这样一些自信的言论的包围。其他人则沉湎于另一版本的关于跨国主义时代的语境之中:“新的”或复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或者财产的种族排外主义模式正在激发着情感和记忆,如果它们并非总是处在民族—国家的水平上的话,那也是处于一个街区、小镇、城市或城市国家、小于或大于国家的区域、甚至一个“文明”这样一些不同的层次之上。^① 这种对比有些夸张,它模糊了情况的多样性。这种对比只表示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或一个对立的两极,而这个对立物也许本身也仅仅是众多的对立中的一个。然而,我的观点只是,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种多语种的讨论,我们对全球性复杂的存在的跨国理解变得更为复杂了,但是,这一努力却不应该放弃。

在何种条件下某一世界性的问题可以被视为以不同语言讨论的“同一个”问题呢?当它在或许相互重叠或许相互不重叠的不同学术文化间流传时,将会发生什么?在我答应编辑这一辑的《印迹》后的这几年来,这些问题一直暗暗使我感到烦恼。我所受的教育是用法文来进行学术思考,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我对英语翻译中那些称为“后结构主义”的奇怪产物或在英国和美国最简单不过的“理论”一词感到迷惑;当这些产物改变了我所工作于其中的澳大利亚语境中的思想程序时,法语就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了。然而几乎同时,似乎用英语来描述那些澳大利亚以外的程序变得更困难了。^② 我开始尴尬地发现,例如不同的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和新西兰人在讨论“多元文化主义”“这个问题”时并不能很容易地互相理解,因为不同的历史经验和对关于国家的不同情感形式——并且因为对于一个特定的讨论的所有各方都会赋予他们的不同点以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在编辑这辑刊物的过程中我从澳大利亚的悉尼转到了香港,这一迁移使我极大程度地明确了对翻译语境中的“相同”进行质疑的紧迫感。我不说广东话,在离开我所使用的语言(对于我来说,由于我的爱

① 见陈光兴,“Not Yet the Postcolonial Era: the (super) Nation-State and Transnationa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10 (1, 1996), 37—70.

② 我在“After thoughts on Australianism”一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Cultural Studies* 6 (3, 1992), 468—475.

尔兰家庭背景,这是一个提升阶级地位的媒介)占绝对优势的生活环境时,我已做好了去适应香港英语受限制的困难的准备。在香港,英语被当成少数前殖民精英的语言,而现在则是当地的或(像我这样)“流亡的”后遣返精英们的语言——然而在香港也有其他的种族和阶级使英语地位降低,如当移民工人,特别是菲律宾、印度和东南亚的妇女使用这些语言时,英语的价值就下降了。既然在关于民族文化理论研究工作中我在运用澳大利亚语进行思考时感到乐趣,我也预见到会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更强烈的是法语的 *dépaysement* [人地生疏]),这使我不能安心努力在这个地方工作,在这里,我除了劣质字幕说明的电影以及对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HKSAR)的复杂的政治的不充分的知识以外,无法进入流行文化生活,我甚至无法用英语参加这里的与“民族”有关的讨论。简要地说,我要对差异做好准备。然而,自从我开始读书以来第一次从一个将公开的种族主义引入“体面的”公众话语的国度来到香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香港媒体中也会有一种相似处。这些媒体用英语大喊大叫什么“非法移民”和“蛇头”(澳大利亚语中所说的“走私人的人”)以及大陆人“低薪应聘”(在澳大利亚,合法移民也这么做)等等。我也没有想到,在对一位印度与马来西亚裔的律师哈林德·维里阿(Harinder Veriah)死于一家香港的医院调查后,会对有关汉族对深肤色人的种族主义是否也是香港的一个问题的争论非常熟悉。(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种族主义的国家还是一个文化最为多元的社会?)^①

我不读中文,只是通过翻译过来的报告,知道这一争论被多种多样的中文媒介广泛注意。英文报告以使我感到吃惊的相似性,署的是一些著名的中国人或一些像是英国人的名字,这与这些报道所产生的反应是一致的;大多数报道似乎产生于相当狭隘的、对种族和移民问题持相对自由的观点的圈子。我赞同许多香港文章和书信中对种族主义和阶级剥削的攻击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在其中起作用的政治观。然而,它们对我的奇特影响(使我怀疑是否真的离开了家乡)来自于它们带动另一种引起分裂的力量的方式:这些是由一种“全球新

① 维里阿,33岁,因患癫痫病2000年1月2日死于Ruttonjee医院。在她死之前,她告诉她的丈夫Martin Jacques,“我处于社会的底层……我是这里惟一的印度人,其他人都是中国人。”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竭力要求香港进行反种族主义立法的运动,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认为这不必要。见“More could have been done for lawy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2, 2000.

闻”的报业辛迪加连续体所制约的媒体报道和争论。这一连续体以相同的方式向每一个市场发送它自己的独特的、极其可怕的、关于社会冲突的爆炸性意象。^① 沿着这个连续体所做的比较工作很少,且经常被扭曲——在读到关于大陆的年轻人是如何更有活力地做香港新闻报道时,我想起了在澳大利亚读过的有关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的相同的报道,并且,叙述的体裁是固定的、标准化的:报道、人的关怀、专栏、思想片断、恐怖故事、生活风尚、特写等等。当我努力地克服对《南华早报》报道2001年初澳大利亚大选中“单一民族党”的复兴(实际上,这个党的选票在当时下降)的恐慌之时,我发现了关于波林·汉森要创一个时装品牌的“轻松的段子”。^②

对于警醒的精英来说,这是流畅的英文,在这里,每一个地方都很像,但是与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有联系。相比较而言,教室中的结结巴巴的英文不断竭力进行比较和“跨文化交流”,却并未产生出更多的东西。在我的第一个学期中,教授有关种族差别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就是一种牵强。我所举的例子,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语境中显得形式多样而有紧迫感,在这里却突然变得很遥远,它们是单调的令人厌倦的“西方”;我的阅读的局限令人痛苦地显示出来。对于我来说,学生们的耐心意义重大。正是他们的能力才使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阅读这些“西方”的材料:有一组学生坚持认为某篇关于种族、肤色、阶级和语言的阶级体制是如何得到社会的吸收和传播的美国文章事实上只是老板和雇工之间地位关系的体现;对此我不能同意(班里的其他人也不同意),但是我想我明白他们的意思。^③ 有时我对正面使用英文词“种族主义”来描述一种自然的对世界的看法感到震惊,同时也对将血缘和祖国的人种学的分类被当成常识感到震惊;我感到我正在听波林·汉森或我的祖父母说话。我没有在听,因此我通过阅读知道了更多的东西。^④ 但

① 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例证,维里阿的死被某些英文报纸拿来(Martin Jacques 对此很愤怒)作为对英国医院中的中国护士的“可怕报道”。有关他自己的叙述,见 Martin Jacques, “Life and death of the bottom of the race pil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6, 2001.

② “Hanson fashions career chan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5, 2001.

③ 这里所指的读物是 Patricia Williams 的精彩论文“The Ethnic Scarring of American Whiteness” in *The House That Race Built*, Wahneema Lubiano (New York: Vintage, 1998), 253—263.

④ Frand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是在这些时候,我不知道这些学生怎么想我所说的话,或者如果我懂广东话,我会怎么想他们说的话。在许多情况下,我对他们的评论的迟钝的反应成为课堂的主要问题;我常常简直不知该说什么。

我学生使用我的第一语言时的流畅程度总是远远高于我使用他们的语言,我们都尽力而为。每周需要进行很大的努力来创造一种有用的确信感,即我们正在努力地谈论“同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构造一个谈论对象的努力失去了客观性,它也用使目标更接近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努力的条件。没有什么标准化的阶级讨论类型真的能帮助我们:我所说的“阅读这篇文章,我们将讨论它”,当他们不能完成足够的英文阅读时,几乎令人沮丧地失败了;他们通篇用广东话大声演讲(常常是讨论五分钟前的翻译)的方式使我发疯。最后,我们临时规定了一种对于我们的讨论行之有效的方式:这有点像翻译接力,学生们用广东话互相帮助,注解我用英语所说的话,接着学生们再用英语告诉我他们刚才用广东话所说的话。这有了许多的依赖性,我并非总是能明白他们哄堂大笑的原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足够多的香港的中国人关于“种族”与移民的争论成为英语媒体的更具批判性的消费者的原因。

翻译的风格问题应该成为《印迹》的理论计划的核心,这个问题是极其困难的。对于这一期,从一开始它就是作为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而出现的:它在何种条件下有可能不仅仅使分布广泛的撰稿者以最得体的语言论述高度敏感的事件,同时也参与对本辑刊物主题的确定?两个层次编辑自身兴趣标准在起作用:首先,是一辑刊物能够黏着在一起,可以作为一个有凝聚性的整体来阅读的愿望;其次,是“同样的”主题在杂志的每一种语言版本中都具有有用的兴趣的需要。协调这两种压力并不是个简单的任务。然而我相信,仅仅以多种语言出版对于挑战流行的理论传播是不够的,除非学院的风格和规范也向批评性的考察和修订敞开。英语的学院现在有了发表言论和批评其他言论的全球性的有力方法。这些言论一方面是有种族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关于移民的。为了译解用英语工作的理性力量与政治暴力,以及它们如何与那些与阶级、与社会的和生理的性别有关的其他区分的相互交叉或相互作用,用其他语言工作的学者们也能对他们自己的“谈论方式”,他们的从事批评的方式以及他们的那种建构被当成一个“问题”的方式来进行译解是至关重要的。